

宗教翻译与中西翻译理论

何立芳

(乐山师范学院 外语系, 四川 乐山 614004)

摘要:中西译学理论起源于宗教翻译,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实践分别为中西译学理论提供了理论思想,是其演进、发展的原动力。然而,由于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具有一些根本性的差异,从而使中西译论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中西译论因此有了不同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佛经翻译;圣经翻译;中西译学理论;轨迹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66(2005)01-0123-04

翻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涉及语言学、文学、符号学、思维科学、阐释学、逻辑学、哲学、社会学、方法论、传播学、美学、系统科学等众多学科领域。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翻译都是一项极其古老的活动。西方最早的译作始于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间,而中国最早的译事则从公元2世纪开始,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语言的翻译几乎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自从有了翻译活动,翻译理论也就沿着各自的轨迹,逐步发展成熟,形成了今天各具特色的中西译学理论。本文拟从发展源头角度对中西译学理论进行对比研究。通过探究中西翻译理论体系各自的发展轨迹和沿革,把握中西译论的命脉,以期能对中国翻译理论系统化和理论化,成为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有所裨益。

一、圣经翻译与西方翻译理论

从纪元初期直到今天,圣经翻译从未停止过,他所涉及的语种范围、译本种数以及译本的使用频率等,都是任何其他作品的翻译所不能比拟的。可见,圣经翻译在西方翻译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

位置,而圣经翻译理论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也可想而知,作者认为,从翻译发展史角度来看,圣经翻译应视为西方翻译最初源头,圣经翻译理论则为西方翻译理论逐步发展成熟的原始依据。

据《西方翻译简史》,从广义上讲,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三至二世纪之间,72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而从事圣经翻译最早的,并以其理论著称于早期宗教界,包括圣经翻译界,应数裴洛·犹达欧斯(Philo Judaeus 公元前20?——公元50?)。他对翻译问题的阐述大致是:圣经翻译是神圣的,译者单凭精通两种语言而无神的感召,便不能从事翻译。当时裴洛的理论被不少人奉为圣经翻译的准绳,圣经翻译坚持“受上帝的感召”、采取直译死译的作法也盛行一时。裴洛把译者变成一种“听写工具”,完全剥夺了译者的自主权。然而,无论译者在圣经翻译时受到上帝多大的感召,动笔时却还得由译者来选词造句,难免会出现主观随意的问题。古罗马后期,在神学家哲罗姆的竭力主张下,圣经翻译的做法有了很大的改观。在哲罗

收稿日期:2004-09-08

作者简介:何立芳(1967-)女,乐山师范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应用语言学。

姆看来,虽然《七十子希腊文本》的译者“受上帝的感召”,在用词方面是不会有有什么上帝的感召的,译者应当按照译文语言的特点移植原文的风格。哲罗姆既是出色的翻译家,又是颇有见地的翻译理论家。他的理论可归纳为:(一)翻译不能始终字当句对,而必须采取灵活的原则。(二)应区别对待文学翻译和宗教翻译。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可以而且应当采取易于理解的风格转达原作的意义。但在圣经翻译中,则不能一概采用意译,而主要采用直译。(三)正确的翻译必须依靠正确的理解。哲罗姆的翻译原则和方法,对后世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提出的许多概念也得到继承。

另一位圣经翻译理论家是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354—430),他是罗马帝国末期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拉丁教义的主要代表,对语言问题和翻译问题颇有研究。他的理论大致如下:(一)译者必须具备以下诸条件:通晓两种语言;熟悉并“同情”所译题材;具有一定的校勘能力。(二)翻译中必须注意三种风格:朴素、典雅、庄严。三种风格的选用主要取决于读者的要求。给一般基督徒翻译,进行“启蒙”教育时,采用朴素风格;给受过教育的读者翻译,重点在于颂扬上帝时,采用典雅风格;为所有读者翻译,以规劝、指引读者时,采用庄严风格。此外,根据读者需要,译者可融三种风格为一体。(三)翻译中必须考虑“所指”、“能指”和译者“判断”的三角关系。这一理论是对亚里斯多德“符号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四)翻译的基本单位是词。(五)圣经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感召。奥古斯丁关于语言和翻译的理论,对后世的语言和翻译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他的符号理论成为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共同财产,直到今天仍在发挥作用。

由于西塞罗是第一个明确提出“直译”和“意译”的翻译方法论的人,许多西方翻译理论的书籍都把公元前46年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哲人西塞罗作为西方最早的翻译理论家,其实,在西塞罗之前从事圣经翻译的神学家们,都在各自翻译的圣经序言或跋中论及过翻译的忠实性问题。只是西塞罗首次提出了关于“不要逐字翻译”的理论,并把翻译分为:作为“解释员”的翻译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即“直译”与“意译”两种基本的译法,从而开拓了翻译理论和方法研究的园地。西塞罗以后,西方翻译理论家便围绕直译与意译,死译与活译,忠实与不忠实,准确与不准确的问题,从不同的角

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追根逐源,圣经翻译开启了直译、意译之河,而西方译学理论也就围绕着这一线路,结合不同理论逐步发展成熟起来。

西塞罗翻译理论大致有以下一些要点:

(一)译者在翻译中应象演说家那样,使用符合古罗马语言习惯的语言来表达外来作品的内容,以吸引和打动读者、听众的感情。

(二)直译是缺乏技巧的表现。应当避免逐字死译,翻译应保留的是词语最内层的东西,即意思。译者的责任是给读者“称”出原词的“重量”而不是“算出”原词的“数量”。

(三)翻译也是文学创作,任何翻译狄摩西尼的人都必须自己也是狄摩西尼式的人物。

(四)声音与意思自然相联,或者说词与词义在功能上不可分割,这是语言的普遍现象,而由于修辞手段以这种词与词义的自然联系为基础,因此各种语言的修辞手段彼此有相通之处。这就说明。翻译可以做到风格对等。

自西塞罗提出所谓“解释员”式翻译与“演说员”翻译,即“直译”与“意译”的两种基本译法,确定了后世探讨翻译的方向,影响到贺拉斯、昆体良、哲罗姆、路德、泰特勒、施莱尔马赫、列维、加切奇拉泽等人。

贺拉斯在文学批评和翻译理论上深受西塞罗的影响,坚持翻译应该活译,反对逐句硬译、死译和生搬硬套,认为翻译应该“意义对意义”(SENSE FOR SENSE)。在《诗艺》中说:“忠实原作的译者不会逐字死译。”这句话常被后人引用,成为活译、意译者用来批评直译、死译的名言。

被誉为西方四大权威神学家之一的哲罗姆完成了第一部“标准”拉丁语《圣经》的翻译工作,他提出的翻译理论也紧紧围绕直译和意译的主题进行阐述:首先强调各种语言的形式差异,主张翻译应忠实于原作的内容,但允许一定程度地偏离语言形式和更改词汇。其次,哲罗姆指出宗教翻译和文学翻译应区别对待,宗教翻译应主要采用直译,而文学翻译则可以采取意译的方法。第三,否认《圣经》翻译中存在着“上帝的感召力”。在翻译中他敢于对《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进行增补、删改和修正;提出对《圣经》的正确理解应依靠广博的知识和熟练的语言能力。此外,哲罗姆还率先提出翻译创造论,认为译者完全可以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优秀的译文完全可以和原作媲美。

昆体良继承了西塞罗“翻译也是文学创作”的观点,在《演说术原理》一书中明确提出“与原作竞争”之说。他指出:“我所说的翻译,并不仅仅指意译,而且还指在表达同一意思上与原作搏斗、竞争”。这就是说,翻译也是创作,这种创作必须与原作媲美,译作应力争超过原作。

之后,无论是法国多雷的“翻译五原则”、17至19世纪法国巴托的“准确翻译”论、英国德莱顿的“翻译三分法”、泰特勒的“翻译之原则”、德国施莱尔马赫的“翻译区分论”、洪堡的“语言哲学观”和“可译与不可译”理论,还是20世纪苏联的费道罗夫、英国的卡特福德、法国的穆南等的翻译语言学理论、美国雅可布逊的“翻译三类分”理论、苏联列维、加切奇拉泽的文艺翻译理论、法国塞莱斯柯维奇和勒代雷的“释意”理论、美国奈达的等效论和“交际”理论等等,尽管表达术语不一,但其实质都论及翻译根本原则,也就是如何处理原文和译文的关系问题。

综上所述,自圣经翻译开启直译、意译之河以来,西方翻译理论虽经历了语文学、语言学、符号学、阐释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融洗礼,但始终没有脱离对直译意译方法论的阐释和变通。

二、佛经翻译与中国翻译理论

从公元2世纪开始,中国开始佛经翻译,从此,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最初的佛经翻译通常这样进行:首先由来自西域或印度的僧人用胡语或梵语口授,另一人译成汉语,记录后再做润饰。所以当时的佛经翻译多文字质朴,力求保存原本面目,多用音译。以后有了通汉语的外国高僧和通梵语的中国高僧,译事达到新的水平。现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一般认为是支谦的《法句经序》。“序中云: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以自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支谦首先提出翻译之不易,接着反映了早期文质两派的译学观点,并表明自己“好文”的译学主张。

如果说支谦的《法句经序》仅仅是文质之争的“头角”,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可视为翻译理论的端倪,他是我国第一个研究翻译并将其翻译理论行之成文的东晋的佛教大师。其理论对原文与译文的语言、内容与风格进行了深入的对比研究,道安作为翻译理论的发端者,他的贡献在于

对汉梵两种语言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涉及到原著、译者、译著读者之间的关系,对翻译实践给予了系统的规律性总结,提出了问题,为后继者指出努力的方向,提供了继续研究的线索。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道安指出翻译佛经在五种情况下会失去本来面目,有三件事决定了译事是很不容易的。提出了“文”与“质”、原作语言、句式、文体的处理问题以及翻译的主、客观方面的困难。道安的后继者们所提出的翻译理论与原则基本上是这几条线索的延伸。

稍后于道安的著名译经家鸠摩罗什虽未正面提出什么翻译主张,但他的“嚼饭与人”的妙喻,却提出了如何表现原文的文体与语趣的问题。他认为以前的译文过于质直,虽得原文大意而失文体之美,强烈感到传达原作文体风格的必要性,对轻重质的干巴巴的译文极为反感。

到了唐代,精通三藏、兼谙梵汉的高僧玄奘又推出他的“五不翻”原则。“五不翻”就是说在五种情况下不译其意,只传其音,也就是只进行音译,将原文语词照搬过来,待讲经时再进行全面讲解,层层展释。这显然是道安“五失本”之论的发挥。

由佛经翻译历程可以看出一个由幼稚的直译而到幼稚的意译,又由较成熟的直译到较成熟的意译,最后到两者兼容的发展模式,由此可进而考察出直译意译的深层原因。佛经翻译既是一种宗教经典的翻译,又是哲学理论的翻译,同时还是一种文学的翻译。而随着佛经翻译的发展所建立起来的佛经翻译理论,则多是从文学角度去讨论翻译的,它与中古时期的文学、美学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其理论概念、范畴就是从传统的文学、美学理论中借用或引发出来的。实际上,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到近现代,仍然还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文艺美学观来表述其理论观点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如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先生就指出,这三字的提出早已见于支谦的《法句经序》中了。傅雷1951年提出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论”,都是源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理论的。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理论主要就是讨论佛经翻译是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文质”之争成为了贯串中古佛经翻译全过程的中心议题,也成为后期中国翻译理论的中心议题。

以佛经翻译实践为依托,以译经序言为主要形态,佛经翻译理论除了以上提及的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还有彦棕的“八备”

说及赞宁的“六例”说。基本上涉及到本体论、主体论、文本论、方法论。我们不难看出,从道安至玄奘,其间的论述已涉及到原作语言、句式与文体的处理,翻译总原则,译者修养以及译作的接受环境等问题,但始终没有人提出明确可循的翻译标准,直到清朝末年严复提出著名的“信、达、雅”翻译理论,明确了翻译家们心目中想达到而难于达到的三项标准。严复的这三项标准其实师承道安有关“文”与“质”的概念。“文”即“古雅流畅”,也就是“达、雅”;质即“忠实原旨”,亦即“信”。严复继承了道安文与质的思路,将文与质调和成一个统一体,被誉为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完成者。自严复 1898 年提出“信达雅”以来,中国的译理探讨都直接或间接地围绕着“信达雅”展开,一直延续到近 20 世纪末。在这种对“信达雅”的阐释接受过程中,呈现出了各种不同的流派。整体观察中国自古至今有关翻译的概念事实、理论事实、甚或经验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发端于佛经翻译的中国翻译理论始终没有偏离“文质之辩”的主题,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沿革大致以 20 世纪的终结为分水岭。自远古至 20 世纪末是中国“信达雅”的诞生、阐释、接受过程;20 世纪末以来,是中国摆脱

“信达雅”形式的桎梏,开始多方位探索翻译学时期。

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的传统译论还是西方的古代译论,都是渊源于佛经翻译或圣经翻译实践,依附于哲学-美学的发展而发展,佛经翻译和圣经翻译实践为中西译学提供理论思想以及演进、发展的原动力。然而,由于中西方的哲学-美学以及宗教翻译具有一些根本性的差异,从而使中西译论具有截然不同的特征。中国佛学强调“悟性”,重直觉体悟而不重逻辑推演,是内在超越,认为美是生活体验,美在现实中,无须外在的超越。西方神学则看重“上帝的感召力”,认为美不在现实中,而在彼岸世界,是一种超越的体验和创造。所以,中国译学理论表达方式含蓄、模糊、非术语化,言简意赅但不乏真知灼见,而西方译学理论概念明晰、术语繁多、逻辑推理性强。这些主要特征对各自译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再加上中西译学理论分别根植于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民族文化土壤不同,社会生态环境不同,中西译论因此有了不同的发展轨迹。

参考文献:

- [1]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北京:译林出版社, 2000.
- [2]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 [3]杨自俭. 译学新探[C].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02.
- [4]王克非. 翻译文化史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 [5]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Religion Works Translations and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HE Li-fa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Leshan Teachers College, Leshan 614004, China)

Abstract: Both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and the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are originated from religion works translations. Just as Bible translation imbued original thoughts into the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so is Buddhism translation to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Given that Bible translation is radically different from Buddhism translation, thus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 are characteristically marked. And their respective development tracks vary correspondingly.

Key words: Buddhism translation; Bible translation; Chinese translation theories;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ies